

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考证

房列曙

到目前为止,关于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,史学工作者的说法不一,当事人回忆也有许多地方出入较大。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及实地考察,对有关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作一考证。

一、先遣队出发的日期

遵照中共中央指示,皖南新四军进行了各项北移准备,先遣队移苏南北渡,就是其中之一。先遣队出发时间的早迟,事关项英执行中央北移指示是否坚决,是否“株守皖南”的问题。按照传统的说法,先遣队于1940年12月初出发,其实是在同年11月26日出发的,这就把项英下决心北移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星期。

1940年12月13日,项英致毛泽东等电报称:“军部之重要器材一千三百担,工作人员千余,自寢日起分开苏南,约筱日到达路南,陆续穿插封锁线北运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寢日”即26日,不可能是12月26日,应为11月26日。查国民党第八督察专署给皖南行署的密报,其中有“该军奉令北移时,其政工人员于十一月底即先

行开始移动”的记载。又据孙琳回忆：“1940年11月下旬，我同方士新等9人一起调离军部战地服务团，到军部总兵站接受新任务。到章家渡兵站后才知道，我们这几个文艺兵同刚从军政治部抽调来的于刚等人的任务是：随……先遣队先期出发。”可见先遣队于11月26日出发是可信的。

应当指出，11月26日出发的先遣队仅20余人，主要任务是沿着到苏南的北撤路线，设立临时交通站，为后续部队筹办军粮，征集民工转运军用物资，属于打前站性质。而先遣队大部队则是此后分三批出发的。第一批是政治部、战地服务处、军服务团等单位的人员和资材，出发时间是12月3日。项英致中央的电报说：“大批工作人员及资材一部已于江日（即3日——作者注）开始分批向苏南移动。”1940年12月6日，国民党第六督察专署密电皖南行署：“新四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于冬晚过境，向马头、杨柳铺一带前进。”这里所说的冬晚，即2日晚，12点以后就是3日了。12月13日，第六督察专署密报皖南行署的电文又称新四军“先头部队约千余微（5日——笔者注）日抵郎溪，经飞鲤桥，（亥）晚经毕桥北山头分赴杨渚”。薛暮桥说：“第一批是十二月初出发的，主要是政治部所属文工人员”。薛的回忆，和上述电文中的日期大体吻合。第二批主要是后勤部、卫生部和教导队的人员，出发时间是12月7日，而不是9日。国民党情报人员蒋鹏志密报第六督察专署称：“Q部之公文及笨重行李、非战斗人员，均于七日夜由天坊之线向马头、杨柳铺开拔，所余者均属武装之部队，考其企图为自卫计。章家渡兵站，在昨前（七、八号）征雇民夫四百余名，搬运粮食及械弹，

安徽省档案馆编：《皖南事变文电选编（国民党部分）》，1985年内部印行，第72页。

邵凯生主编：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23页。

《皖南事变文电选编（国民党部分）》，第61页。

《皖南事变文电选编（国民党部分）》，第70页。

《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·皖南事变》，第358页。

阮世炯、杨立平主编：《纪念“皖南事变”50周年专辑》，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33页。

亦由孤峰之线推进。”第三批是军需处等单位的人员，由宋裕和带队。

二、章家渡浮桥是什么时候搭的

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奉命北移，行至青弋江边，准备从章家渡渡江。教导总队工兵连在章家渡搭起一座浮桥，让部队通过。浮桥是什么时候搭的？一说是“1940年12月底”，另一说是“1941年元月4日夜”。

据《皖南事变要报》载：“四日夜，照原定计划各纵队由原地出动，分三路向大康王、凤村、茂林、潘村、铜山前进。因连日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且河水高涨一尺余，原定之各徒涉场均不能徒涉。故临时改变计划，由章家渡架浮桥渡河。”又据1941年2月李一氓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：“四日大雨，晚间青弋江水涨，原来决定徒步，此时不得不搭浮桥。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，搭好后还差二十米，又拆后重搭。”原负责架桥工作的王世忠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他写道：“1941年元月4日夜间10时左右，军部命令我工兵队必须在午夜前赶到章家渡，在午夜后2点前在青弋江上架好浮桥，确保大部队按时过江。”他们赶到章家渡“已近午夜”，“整个架桥作业于5日临[凌]晨1点多完成了”。可见，章家渡浮桥是1月4日夜搭的。

《皖南事变文电选编(国民党部分)》，第67页。

一说称“工兵队”。

《纪念“皖南事变”50周年专辑》，第121页。

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第71页。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53页。

李一氓：《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”——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》，《人物》1992年第5期。
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第71—72页。

三、与项英一起离队的到底是几位领导人

临时动摇一起离队的领导人到底是几个人？原警卫员黄诚回忆说：“我记得那是 1941 年 1 月 8 日晚上，我们在石井坑左边东流山侧面的山上。大家都坐在一条小路上，背靠着。我和副参谋长也坐在那里休息。我迷糊地睡了一会，副参谋长就推了我一下说：‘走啊！’我就起来跟在他后面走。我们是走在最后了，前面究竟有多少人，我不清楚。当时有个印象，看到前面那个向导穿件破棉袄，下面穿条夹裤。还看到有个穿皮茄克的，当时我还不晓得是李一氓同志，后来才知道。还有项副军长和警卫员包子（即夏冬青）、郑德胜，还有袁国平和他的 2 个警卫员（姓名记不清）。”原警卫排长李德和也回忆说：“10 日天明到达石井坑一带。下午一二点钟，五团从高岭经内潭仓赶到石井坑，项英、周子昆、袁国平、李一氓等首长和警卫员夏冬青、郑德胜等一行也回到军部。他们与叶军长会合时，只见饶漱石将一份电报拿给项英看，听到项说，‘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你们办吧。’情绪有些低沉。”

黄诚和李德和的文章发表后，李一氓于 1986 年 1 月 5 日发表《申明》说：“《云岭》十五期第二页载《黄诚忆项英……》一文，第八页载李德和《关于项英……》一文，都提到 1941（年），1 月 8 日项英等同志脱离部队一事，列名项英、袁国平、周子昆和我四人。其实是项、袁、周三人在一起，没有我。具体情况，当时军部已有电报报告中央，事后我也有电报详报中央。两文所记与事实不符，特此申明。”

如何评价李一氓的《申明》？首先让我们看 1941 年 1 月 9 日叶

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第 50 页。

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第 63 页。

《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》，第 64 页。

挺、饶漱石关于项英等“行方不明”给毛泽东等的电报。电报称：“项英、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，行方不明”。这里列名的有项英、国平两个人，还有，也是两个人，加起来应为4人。再看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教训的总结，其中说：“最可耻的是项于八日晚即偕国平四人离开部队潜逃。”讲的也是4人。

那么，李一氓何以申明只有项、袁、周3人呢？李一氓于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是这样说的：“晚十时左右，项忽派人叫我几次，皆未找着。等我回到我的位置，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，遂去项处，那时袁国平、周子昆皆在。项一手握我，一手握袁，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，即匆匆向后走，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。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，还以为找地方开会，决定最后处置。但又不见有老叶，行数十步后，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，周又自语说，他没带钱。我才恍然，项又要来他三年游击那一套。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，项反答叫了他不来。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，我立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。项即反问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说，我另想办法打游击，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，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，我还想把军法处、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、繁昌过皖北。项当即表示赞成，与我握手，并说把××（电文不清）也带走，他身上还有钱。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，又听说今晚无把握，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，结果仍与项、周同走，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，于是分手，他们继续前进。”我一个人转回后，因找张元培、胡立教及军法处、秘书处的人未找着，首先遇见李步新（皖南特委书记），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，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。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但又觉得太突然，刺激太甚。我想留下与叶一块，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，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，即或算开小差吧，也

《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·皖南事变》，第108页。

《皖南事变》（资料选辑）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71页。

是奉命的。遂决定不告诉叶，仍然退出。找着张、胡、杨(帆)等，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，也就离开了队伍。”项英归队后，于1月10日打电报给中央，说“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(同我走)”。既然有“同我走”，那就还有没有同他走，说明他们一起走的的确只有3人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叶挺给中央电报中以及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的项英等4人脱离部队，是就此次离队事件而言的，即先后共有四位领导人。李一氓是在项、袁、周离队后，又带了近30多人离队的。因此，李一氓的《申明》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因为就具体的时间概念而言，他们不是一起离队的。但就大的时间概念即此次离队事件而言，他们又是一起离队的。

四、东流山失守过几次

东流山是黄山的余脉，位于茂林镇的东南侧，离泾县城三四十华里，主峰海拔800多米。它是石井坑的制高点，关系着新四军的安危，成为两军反复争夺的要点。东流山曾于10日、11日、12日三次失守，新四军于10日、11日、12日三次展开争夺东流山的战斗。

1月10日，教导总队工兵连(一说工兵队)第一次夺回东流山。笔者曾访问原教导总队四队教导员陈念棣。他说：“10日上午，叶军长命令工兵连迅速登上东流山，筑构工事，把制高点控制在自己手里；教导总队其余的部队分别占领象形山和虎形山一带阵地，保护军部。”又据许筠回忆：“10日，叶军长命令五团立即开上东流山，守住这个制高点，把在那里守卫的教导总队换下来。”早上

《人物》1992年第6期。

《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·皖南事变》，第109页。

1983年8月14日笔者访问陈念棣谈话记录。

许筠：《皖南事变中的张正坤和梁金华》，未刊稿，周祖羲整理。

6 时许,工兵连到达山顶制高点下面的两个山头时,顽 40 师 119 团、118 团一部已占领山顶。国民党第 32 集团军战斗详报记载:“10 日,四十师一一九团主力及一一八团一部,于午时占领东流山最高点,刻正扫清残匪中。”这里所说的午时指 13—14 时许。工兵连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山头,与占领山顶之敌展开血战。黄昏,五团和教导总队前来增援,夺回了制高点。

上官云相对 40 师丢掉东流山的制高点十分恼火。40 师师长方日英于 11 日上午 11 时命令 119 团主力由东流山逐次向北攻击前进,并与双家洲 156 团切取联络;120 团以陈营推进至坦里口附近,对北严密警戒;118 团确保高坦徐两侧高地及要隘,相机策应 119 团作战;由榔桥镇至陈营之通信,由师通信连架设之;并令 118 团屠营即刻出发,增援东流山,归刘团长指挥。刘团奉命后,即向东流山进犯。下午 3 时,119 团和 118 团将“东流山之最高峰”占领大半;5 时“全部占领”东流山,是为东流山第二次失守。

顽 40 师一部占领东流山制高点以后,叶挺派陈忠率一个整编营前来增援。这个营由一纵突围受阻返回石井坑的全体指战员整编而成,陈忠任营长,下辖三个连,每连 100 多人。同时,新老三团占领五团右边前沿阵地,支援五团反攻东流山。在陈忠营和新老三团一部的支援下,五团于 11 日傍晚又夺回了东流山最高点。

东流山第三次失守是 12 日 17 时。据《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》记载:“四十师刘团于本日(12 日)16 时许将东流山及其以北无名高地之匪包围,该团以果敢之攻击,遂将该匪击溃,当即占领该山及各高地。”又据《国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》记载:1 月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,第 185 页。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,第 211—212 页。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,第 211—212 页。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,第 188 页。

12日“午后5时许，遂将东流山及其以北高地完全占领”。《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》也说：“本日（12日）我炮兵援助友军之攻击，于十七时即将东流山攻克。”

东流山失守后，白山、憨山头纷纷告急。叶挺命令余立金带领教导总队发起反冲锋，堵住敌人，让军部有时间组织部队分散突围。余立金召集教导总队干部会议，决定教导总队的四个队合并为两个大队，反攻东流山，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突围。下午5点半，兵分两路，发起攻击。大约在13日凌晨，香炉墩、象形山相继失守，教导总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。叶挺命令向火云尖转移，教导总队撤离了东流山。

五、袁国平是突围牺牲不是自戕身亡

关于袁国平的牺牲，一说1月13日，袁国平自戕自亡；另一说袁国平于1月13日下午在战斗中牺牲。

两说相同的是袁国平牺牲于1月13日；不同的是袁国平自戕身亡，抑或是在战斗中牺牲。其实两说都不准确。

事实是袁国平从石井坑突围，于1月13日到达大康王的西坑后，坑口被国民党108师封锁，以教导总队为主的几次猛冲，都冲不出去。1月14日傍晚，他们就放弃向北面青弋江方向突围的计划，转向西坑坑尾分散突围，袁国平随着几百人冲上球岭，与包围的顽军激战，一部分冲向承流峰，袁国平随另一部分约200多人冲过球岭，隐蔽在东坑。15日黄昏，顽52师156团3营包围了东坑，袁国平率200多人连夜分散冲出包围圈。袁国平一行越过徽水河，向东北方向突围，顽军分区搜剿。为了减小目标，他们不断分散。19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，第213页。

《皖南事变资料选》，第291页。

《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06页。

《叶挺传》，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27卷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59页。

日拂晓,袁国平等十几个人突围到巧峰镇附近,遇上 52 师 156 团 3 营的搜剿。上午 10 时,他们被冲散,隐蔽在附近的丛林里,政治部勤务兵被捕。下午 1 时,他们眼看被包围,一起向外猛冲,袁国平不幸中弹牺牲。正如《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刘秉哲部围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》所载:“十九日拂晓,一五六团殷营至巧峰镇平源中间地区清剿散匪,辰刻遇匪十余名携短枪四处逃窜,我当向该匪射击,俘匪政治部勤务兵刘洪深一名,余深匿丛林中,下午一时被我包围,企图猛冲突围,遭我迎击后,当击毙匪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及其随从参谋陈某。击毙袁国平后,当摄其尸像,呈送军部六帧,并由其衣中搜出生前像片二张,同时呈送。”

(责任编辑:曾业英)

(作者房列曙,1951 年生,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)